

罗宗强
著

晚学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罗宗强
著

晚学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学集 / 罗宗强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310-03174-0

I. 晚… II. 罗… III. 文学史—中国—文集 IV. I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9673 号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6.625 印张 5 插页 285 千字

定价: 52.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目 录

从《文心雕龙》看刘勰的知识积累

——读《文心雕龙》续记 (1)

我国古代文体定名的若干问题..... (23)

朱元璋的文章观与洪武朝的文学思想导向 (47)

论明代景泰之后文学思想的转变 (84)

隆庆 万历初当政者的文学观念

——以 1567 至 1582 年为中心 (114)

社会环境与明代后期士人之心态走向 (138)

从雅化到俗化

——东晋和明代后期江南士风研究札记 (153)

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 (177)

自然范型:李白的人格特征 (194)

论李诗的艺术风格	(205)
一个永恒的研究课题	(223)
诗的人文传统问题	
——关于选诗和解诗的一些问题	(225)
海子诗中潜流的民族血脉	(257)
解读海子的诗《思念前生》	(286)
目的 态度 方法	
——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	(301)
我们如何进入历史	(312)
事件与人物	
——从王阳明说起	(326)
读书忆旧	
——读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稿》	(345)
老人不再耳提面命	
——读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	(351)
舍易就难 舍热就冷	
——谈傅璇琮《唐诗学论稿》	(358)
李白研究的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	
——读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	(365)

我们非常需要不尚空谈的书	
——读蒋寅《大历诗风》札记	(370)
一部实实在在的文学史	
——读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	(379)
读王水照编《历代文话》	(383)
郭笃士先生《草庐联话》序	(387)
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序	(390)
涂光社《庄子范畴心解》序	(393)
李瑄《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序	(416)
后记	(420)

从《文心雕龙》看刘勰的知识积累

——读《文心雕龙》续记

读《文心雕龙》，常为一个问题所困扰。在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何以在齐、梁之际能够出现一部理论体系如此完整严密的巨著。这样一部巨著，何以能在深度与广度上达到这样高的水平。这样一部理论思维能力极强的巨著，何以能用限制极大的骈体写得这样的华美而又涵蕴深厚。就是说，我们常常力图说明这样一部书“是什么”，而我感到困扰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部书？为什么在它之后，很难再找到像它这样宏大严密的理论著作？我想，窥测刘勰创建他的庞大的理论体系靠的是什么，他之所以能创建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探讨这个问题或者能对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有某种借鉴的意义。

—

我们涉及的这个问题，关系到刘勰的素养。他创建如此精深的理论，首先面临的是一个知识结构的问题。我们现在很难具体了解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都看过一些什么书，他在那些书中受

到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们能够从《文心雕龙》中看到他所引用的书,并且从他引用的角度窥测他对那些书的理解,窥测那些书在他的理论构成中所起的作用。

《文心雕龙》引及作者 322 人。^① 其中一些作者,在书中被反复提到。据我的统计,其中提到 26 次的 1 人:扬雄;提到 25 次的一人:曹植;提到 24 次的 1 人:司马相如;提到 22 次的一人:陆机;提到 18 次的 2 人:班固、张衡;提到 14 次的 1 人:潘岳;提到 13 次的 1 人:贾谊;提到 12 次的 2 人:宋玉、王粲;提到 11 次的 2 人:曹丕、枚乘;提到 10 次的 2 人:屈原、蔡邕;提到 9 次的 5 人:司马迁、桓谭、崔瑗、张华、刘桢;提到 8 次的 2 人:左思、崔駰;提到 7 次的 8 人:孔子、东方朔、马融、杜笃、孔融、傅毅、陈琳、陆云;提到 6 次的 3 人:王褒、曹操、应瑒;提到 5 次的 11 人:荀子、陆贾、班彪、邹阳、崔寔、阮瑀、祢衡、嵇康、潘勖、张载、温峤。5 次以下的人数最多,其中只提到一次的有 233 人。提到的次数多少虽不能说明被提到的作者对刘勰影响的大小,也不能绝对地说刘勰对他们评价的高低;但似乎可以说明,那些被反复提到的作者,有可能是他最为熟识的作者,或者是作品涵盖面广,适于在不同的篇目中作为例证加以引用的作者。从这个名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提到次数多的作者,大体上是各种文体中的重要人物。其中有两个例外需要说明,一是屈原,只提到十次,按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刘勰对他的推崇看,

^① 我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说过《文心》一书,引及作者 248 人以上。兴膳宏教授《文心雕龙人物略传》只列出 115 人,他说明这只是主要作者。我此次统计,凡书中称作者的都列入,如庖牺画八卦之类。之所以作这样的统计,是考虑到这是刘勰的理解;而非以我们今天的标准加以衡量。

他被提到的次数无疑应在扬雄与宋玉之上。之所以只提到十次，是因为刘勰已专章设立《辨骚》，集中论述了屈原创作的地位与价值，在其他篇中也就不再反复出现。另一位是孔子，之所以只提及七次，也因为已经有《征圣》、《宗经》两篇，集中论述了圣人的思想。而且，此一种之思想，在全书的论述过程中每每出现。在书中，他对于孔子的评价是至高无上的，提及次数的多少无碍于他对孔子的评价。

从他所提及的作者，以及对于他们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出他兼容并包的治学倾向。他提到儒家的孔子、孟子、子贡、子夏、子思、荀子、孔悝、陆贾、贾谊、扬雄、董仲舒、孔安国、郑玄，当然也提及儒家所推尊的尧、舜、文王、周公；他提及道家的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公孙龙子、刘安；提到玄学家何晏、王弼、郭象、向秀、夏侯湛；提到法家商鞅、韩非；提到墨子；管子；提到史家司马迁、班固、刘向、刘歆、孙盛、干宝等等；甚至还提及兵家的孙武。各个学科，各个学派，他都接触到了。可以说，对于他之前的思想文化遗产，他有着广泛的了解。

《文心雕龙》一书，引及作品 436 部、篇。^① 引用原文 223 处。从他所提及的作者与所引的专书、单篇与文句，我们能够窥测到他所接受的文化遗产的广泛影响，可以大致了解他的知识积累状况。

从他的引书中，我们知道他看过的经书有、《诗》、《书》、《礼》、《易》、《春秋》。在书中，他引用最多是《诗》、《易》、《尚书》，对春秋战国史和礼制的熟识程度，对于他这样一位当时只有三十馀岁、在

^① 指提及书名与篇名者，有的是引全书，有的引单篇，单独计算。有的只引文句，不计于此，而计入引用原文之内。

寺庙校经的青年人来说,确实令人感到惊讶。惊讶于他的敏锐与广博。他看过的史书有《左氏传》、《公羊传》、《战国策》、《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张莹《后汉南纪》、薛莹《后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孙盛《魏氏春秋》、鱼豢《魏略》、虞溥《江表传》、张勃《吴录》、陈寿《三国志》、陆机《晋三祖纪》、王绍《晋纪》、干宝《晋纪》、孙盛《晋阳秋》、邓粲《晋纪》,共 23 种。可以说,在他的时代,大部分的史书,他都读了。可以证明他都读了的理由,是他对每一部的史书,都或评论,或引用。而且这些评论、引用,均非泛泛阅读所能做到。例如,他论孙盛《晋阳秋》,称其“以约举为能”。孙盛《晋阳秋》已佚,清人汤球有辑本。我们从辑本看,孙盛记事,确极简略。如其记景元三年杀嵇康事:称“嵇康性不偶俗,而尚奇任侠”^①。对嵇康性格此一极简洁而又确切的概括,为后来诸多史家所沿用,说《晋阳秋》的特点是“约举”,确为不易之论。他论干宝《晋纪》,称:“以审正得序”。在《才略》篇中他又说:“孙盛、干宝,文盛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审正”是判断正确,“志乎典训”是以经典为准的。对于干宝《晋纪》的这一评价,亦非泛泛之论,必是认真阅读且也深思后之所得。干宝《晋纪》已佚,但汤球辑本中保存的史论,仍可见其大致面貌。在这篇史论里,他直言晋之兴,非由积仁义而得之,乃由武力之争夺。故其得之速而其败亦速。干宝修史,尊崇《春秋左氏传》的传统,重“正名”。儒家本有为尊者讳的思想,干宝敢于直面晋之建立者的不义之举,随之论及其朝政之一系列乱象,以明其必亡之

^① 孙盛《晋阳秋》卷一,乔治忠校注《众家编年体晋史》页 97,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因。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干宝论晋之创业之本，固异于先代，后之作史者，不能为此言也，可谓直矣。”^① 从这篇史论里，我们也可以了解干宝之修史，确如刘勰所说，是“审正”。自整体的修史思想言，干宝以经典为依归，是“志乎典训”的。唐人李华，也看到这一点，他借萧颖士之口说：“干宝著论，近王化根源。”^② “近王化根源”，亦“志乎典训”意。既志乎典训，又审正得序，刘勰对于干宝《晋纪》之此一论断，分寸把握得十分准确。从孙盛、干宝两例，我们可以看到彦和史书阅读的深入、认真程度。他阅读史书的深入，我们还可以从他对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引用中看出来。对这三部书的引用，其熟识的程度，我们从下列几点可以看出来。一是对于历史的发展了如指掌，《文心》全书引《史记》26篇：《夏本纪》、《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乐书》、《封禅书》、《齐太公世家》、《赵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商君列传》、《苏秦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淮阴侯列传》、《酈生陆贾列传》、《匈奴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滑稽列传》、《太史公自序》。引《汉书》46篇：《文帝纪》、《武帝纪》、《宣帝纪》、《律历志》、《礼乐志》、《食货志》、《郊祀志》、《五行志》、《艺文志》、《刘向传》、《王陵传》、《淮南王传》、《石奋传》、《晁错传》、《邹阳传》、《枚乘传》、《枚皋传》、《路温舒传》、《韩安国传》、《李广传》、《董仲舒传》、《司马相如传》、《公孙弘

①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

② 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全唐文》卷三百一十五，页3198，中华书局1983年版。

传》、《兒宽传》、《杜钦传》、《严助传》、《朱买臣传》、《吾丘寿王传》、《贾捐之传》、《王褒传》、《东方朔传》、《韦贤传》、《赵充国传》、《王吉传》、《韦玄成列传》、《张敞传》、《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东平思王传》、《匡衡传》、《孔光传》、《扬雄传》、《陈遵传》、《外戚传高祖吕皇后传》、《外戚传孝武李夫人传》、《元后传》、《王莽传》。引《后汉书》44篇：《光武帝纪》、《章帝纪》、《隗嚣列传》、《窦融列传附窦宪传》、《鲁恭列传附鲁丕传》、《马援列传》、《宋弘列传》、《冯勤列传》、《桓谭列传》、《冯衍列传》、《张纯列传》、《曹褒列传》、《贾逵列传》、《班彪列传》、《班固列传》、《沛献王辅传》、《张敏列传》、《胡广列传》、《周荣列传》、《郭躬列传》、《王充列传》、《崔駰列传》、《崔瑗列传》、《钟髡列传附钟岱传》、《臧洪列传》、《张衡列传》、《马融列传》、《蔡邕列传》、《左雄列传》、《荀淑列传附荀悦传》、《陈蕃列传》、《孔融列传》、《宦者列传蔡伦传》、《儒林列传尹敏传》《文苑列传杜笃传》、《文苑列传李尤传》、《文苑列传苏顺传》、《文苑列传傅毅传》、《文苑列传王逸传》、《文苑列传祢衡传》、《方术列传王真传》、《列女传班昭传》、《礼仪志》、《祭祀志》。刘勰对三书上述纪、志、传的引用，分布于《文心雕龙》五十篇之中的三十三篇。这三十三篇，既涉理论枢纽部分，亦涉文体论、创作论与批评论。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要求，他都能引得恰到好处，例如，对文体论，他遵循“原始以表末”的原则，追溯各种文体的发展史，需要列举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他一般按照历史顺序引用。他知道哪些代表人物在什么情况下写出了哪些作品，仿佛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在创作论中，论述的是理论问题，他也能从史书中找到恰当的实例，加以阐发。例如，《神思》篇论为文之驰神运思，为了说明创作时之驰神运思，

其条件之一是受制于秉赋之才气大小,才气不同而成篇有快慢,他例举了几个代表性人物的创作实际:“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沉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终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鞍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此十二例中,有六例来自《汉书》、《后汉书》,非熟读此两书,不可能在考虑文思迟速之理论问题时知道在什么地方有贴切之例子。二是这三十三篇的引用,有的是直引其事,有的则是曲折引用,从其一言半语,再证以他书。不熟读此三书,不可能做到例举时出神入化。他对于其他史书的引用,亦有类似之情形。从上述的简略说明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刘勰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知识的积累。此一种之知识积累,不仅使他对文学发展过程之历史环境有了深切之感知,在论述文学理论问题时紧扣历史真实之情景,不作无根之空谈。凡有所论,都给人以历史之实感。而且,也使他在论述文学理论问题时,能够更好地把握文学发展过程的特点。近二十年来学术界论及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之民族特点时,常引刘勰的理论为例,来说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之民族特点。这也说明,刘勰深厚的历史知识积累在理解、把握和表述文学的民族特色时的意义所在。

刘勰除大量阅读史书,从中了解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从中接受思想的熏陶之外,他更多的是大量阅读子书。他以一种兼容的态度,接受思想遗产。在《文心雕龙》中,我们看到他读了《管子》、《墨子》、《鬻子》、《老子》、《文子》、《孙子兵法》、《孟子》、《韩非子》、《庄子》、《荀子》、《晏子》、《尸子》、《尉繚子》、《列子》、《鬼谷子》、《鹖冠

子》、《邹子》、《青史子》、《吕氏春秋》、《新语》、《新书》、《说苑》、《法言》、《潜夫论》、《政论》、《昌言》、《申鉴》、《淮南子》、《典论》等近三十种,还不包括单篇的论文,如他论及的魏晋时期不少玄学家的著作。在这近三十种的子书中,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小说家,杂家。可以说,在他之前的主要子书,他都读了。对于他之前的思想发展史,他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创作论中他引用《庄子》15次,涉及《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德充符》、《骈拇》、《天道》、《秋水》、《知北游》、《徐无鬼》、《外物》、《天下》诸篇。有的是引用其术语,有的是直接用其文句,有的虽引其文句而改变其用法,有的则是引其思想而以己之言语表达。在《文心》中大量引庄子,说明刘勰对庄子的熟悉程度,而他在《文心》中所表述的思想,却并非是庄子思想之照搬,他是经过吸收、融合之后变成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的。中有庄子的影子,而又非庄子之思想。老子、列子、孟子、荀子、淮南子等的影响在《文心》中同样存在着,也同样是吸收、融合了,变成了刘勰的思想,而非任何一家。佛教和道教,同样对《文心》产生影响,而表现得更加深藏,更加隐蔽。你分明知道它们的存在,但直接的确证,却不易说出,说出来只能是类比、影附,影影绰绰。刘勰对于诸子思想之此种接受形态,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他对于诸子思想之了解,已经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他不是一般的阅读,而是阅读中有深入之思索。从诸子对《文心》的影响中,我们看到刘勰对于他之前的思想史有着深入的理解。他积累了思想史的丰富的知识,而且在思想史知识的积累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为他撰写《文心雕龙》作厚实的思想理论准备。

为撰写《文心》最为重要的知识准备是对于文学史的全面而深入地掌握。无论是作家作品,还是各个时段文学发展的特点,或者是已有文学批评的得失,他都了如指掌。我们看他论及文体 81 种: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 14 种为有韵之文;史传、诸子、论、说、诏、策(诏、策又包括 7 种细目)、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笈、记(笈、记包括 24 种细目)46 种为无韵之笔;杂文 19 种中典、诰、誓、问、览、略、篇、章为无韵之笔,其余为有韵之文;谐、隐无一定之体,可入文,亦可入笔。此 81 种文体每一种产生之原因、用途,最初之体式特点,发展过程中之变化,成熟之形态,他都给了甚为细致之描述。正是在此一种全面了解的基础上,他才能对各种文体之理想形态作深入之思考,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释名章义”到“敷理举统”。在他之前,虽有不少论及文体者,如李邕、曹丕、挚虞、李充等人,但没有一位像他那样全面而深入地给了各种文体以系统的阐释。他不仅对文体的发展史有深入之了解,而且对不同时段文学发展之特点,也十分清楚。我们看他对不同时段文学之描述,就会惊异于他把握之准确。他把自己对于历史发展的知识,与文学发展之特点联系起来,高屋建瓴地作出概括。如他论建安文学,称其梗概多气之特点,乃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之社会风气所致。说江左玄风之盛行,影响到文学风貌上来,就形成其时特有之文学风尚,“是以世极迍邐,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① 他的这些见解,为后世论者所普遍接受与赞许,就是因为它准确而深刻。之所以能达到

^① 均见《文心雕龙·时序》。

如此之准确与深刻,就因为他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有着极为丰富的知识。他对于作家了解面之广与深,也是前所未有的。凡所论及,都反映出他了解的细致深入。仅举一例,即可说明。《才略》篇论及作者 94 人之才华。才蕴于内,华发于外。此 94 人之才华高低,反映在创作上的风貌,刘勰一一加以论断。如果没有对此 94 人之作品与其人之才性作全面之研究,决不可能以一两句评语而概括一位作者及其作品之特点。如论曹丕兄弟,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此一评论,包含着几个层次:一是认为旧谈扬植抑丕之评论不公;二是指出不公之理由,称曹丕并非无才,他也是才情丰盛而且清丽的,只是他思虑周密,所以落笔迟缓。但是他乐府写得好。在《乐府》篇中刘勰论及乐府时,也说:“魏之三祖,气爽才丽”,他举出的例诗,是“‘北上’众引,‘秋风’列篇”。“秋风”指的就是曹丕的《燕歌行》。在《诏策》篇中他又称赞曹丕的诏书写得好:“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显然他认为曹丕有所长。丕与植之差别,只在于才之表现的不同形式而已。从他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是经过认真的比较之后才下结论。他评论作家作品,常常使用比较的方法,如“嵇志清俊,阮旨遥深”;“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封禅》靡而不典,《剧秦》典而不实”等等。要比较,就要占有丰富的文学史料。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他撰写《文心雕龙》之前文学史知识积累的情况。

广泛而又深入的知识准备,不仅为刘勰提供了撰写《文心雕龙》的素材,而且在知识准备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他的思维习惯,影响着他的思维方法。论《文心》者多注意到刘勰研究方法之特点,但对于他究竟持何种之研究方法,则看法并不一致。我们先从《文心》论述之过程,窥测其知识准备过程中所受之思想训练,窥测其思想形成过程所受之影响,然后判断他研究方法的特点。

我们从他论《史记》中,可以看到他兼取两端、不偏一局的思维方法。他论述史书撰述之难度与责任重大时,对司马迁有一总的评价。他说:“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通”,可简单理解为博通,但亦可理解为彦和在此一段文字之前提及的良史之标准:“若乃遵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掩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这个万代一准,既包含着“尼父圣旨”,也包含着“良史之直笔”。这是说,既宗经,亦其实录之精神。“通”,是说司马迁通晓此万代治史之一准则。司马迁史学思想中有尊孔的一面。他在《史记》中特立《孔子世家》,对孔子备极推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在《孔子世家》中有甚为明确之宗经思想。彦和在尊孔尊经这一点上不能说没有《史记》的影响。在《史传》篇中,他说:“是以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史记》的宗经思想影响着刘勰的史学观,但是《史记》的实录精神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刘勰。在《史传》篇中,他评论《史记》,称:“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贤圣。”“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